

# 赵万里文存

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 
付佳 选编

赵万里

此獨立之精神

由之思想

存千万祀

與天壤而同久

共三光而永光

清华  
国学  
书系





# 赵万里文存

ZHAOWANLI WENCUN

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

付佳 选编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赵万里文存/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;付佳选编.  
—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6.7

(清华国学书系)

ISBN 978-7-214-19158-8

I. ①赵… II. ①清… ②付… III. ①国学—文集  
IV. ①Z126.2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59192 号

书 名 赵万里文存

---

主 编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

选 编 付 佳

责 任 编 辑 卞清波

装 帧 设 计 姜 嵩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邮编: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34.75 插页 2

字 数 465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214-19158-8

定 价 68.00 元

---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## 导言 赵万里生平与学术

赵万里(1905—1980),字斐云,号芸盒、舜盒,浙江海宁人。天生聪明颖悟,少时即有志于文史之学,先后入国学大师吴梅、王国维门下,得二氏之亲传,受教匪浅。他一生主要供职于北平图书馆,任善本部主任、研究员,又为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校兼职教授。赵万里是著名的文献学家,长于目录、版本、辑佚、校勘之学,在金石学、词曲学方面亦造诣颇深。

### 一、赵万里之生平

1905年5月7日,赵万里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城的啸园。海宁自古为人杰地灵之所,明清以来更是人才辈出,文化气氛十分浓郁。赵家也是书香门第,祖父赵承鼎,是个廪生,以开馆授徒为业。父亲赵宗孟,善作诗,工书法,在上海商界任职,为沪上书法界名人。赵万里童年受教于母亲和祖父。母亲张顺媛是他的启蒙老师,学前已教他识得千余字,背诵唐诗数十首。祖父则教他学习《四书》,培养他研究国学的兴趣。六岁入海宁达材小学,学习勤奋,成绩优异。十二岁考入嘉兴市省立第二中学。他致力于学,尤其喜好文史,得到了陆颂襄、刘毓盘两位宿儒的指

教,学业上有所精进。刘毓盘是著名词人和词学家,赵万里对词曲研究产生兴趣应是受到了他的影响。

1921年,年仅十六岁的赵万里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国文系,师从吴梅,研习词曲。吴梅是词曲研究大家,在人才培养上更是桃李满园。执教东南大学期间,唐圭璋、王季思、任中敏、卢冀野等齐集门下,后皆成为词曲研究名家。赵万里后来虽不专攻词曲,但在词曲校辑、词曲史研究方面也有所成就,这跟吴梅的教导是分不开的。吴梅曾在王季思的习作批语中写道:“自万里(赵万里)、雨亭(孙雨亭)、维钊(陆维钊)之后,复得斯才,我心喜极。”<sup>①</sup>可知吴梅亦将赵万里视为得意弟子、可造之材。以吴梅为中心的国文系师生,坚持古典诗词的创作,常结社集会,互相唱和联吟。赵万里常参与其中,习作填词。浦江清、王季思等人的著述中都存有他们即席联句的词作,可见一时之风雅。当时东南大学提倡以传统方法研究国学、整理国故,重视小学,注重古籍的校勘、疏证。在顾实、陈中凡等老师的教授下,赵万里系统学习了古文字、训诂、校勘、音韵等小学方面的知识,为之后校释、研究古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1923年,他在东南大学《国学丛刊》上发表了处女作《述录、方二字义》一文,内容为古文字的考释。大学期间,他更醉心学业,勤于读书,常常废寝忘食。曾费尽千辛万苦得到机会,获允到南京图书馆阅读丁氏八千卷楼的藏书。为了多看书,中午不返校吃饭,只以一两个炊饼充饥,这样坚持了一年有余。读书的同时,还开始刻意搜求、收藏书籍。他生活简朴,将节余之钱都用来买书,几年间所得颇丰,盈橱满屋,还手抄了《水云楼词》、《烟霞万古楼诗》、《黼黻图回文诗》等古籍,其爱书、藏书之嗜好日渐养成。

大学毕业后,经吴梅推荐,赵万里于1925年7月赴北京拜王国维为师。他与王国维既是同乡,又为姻娅,按辈分王国维是他的表姨父,但此前他仅在海宁谒见过王国维一次,彼此并不相熟。拜师当天,他还请了蒋复璁作陪,奉上束脩,按传统入室之仪行了叩拜大礼,执礼甚恭。这一

<sup>①</sup> 王季思:《玉轮轩后集·回忆吴梅先生的教诲》,广州:中山大学出版社,1994年,第29页。

年,王国维被聘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导师。起初王国维命他馆于家,恰逢研究院聘请的助教陆维钊因事未能赴职,于是赵万里承其乏任清华研究院。助教的工作主要是为王国维检阅书籍、抄校文稿。有了入室弟子和助教的双重身份,他得以随侍王国维左右,时常受教。获此得天独厚的问学请教之机,他在学问上自是受益良多。在侍读过程中,赵万里开始了解、熟悉王国维的治学领域,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视野,涉猎范围延伸至目录版本学、考据学、金石学、地理学等方面,并逐渐掌握了以史料为支撑的研究方法,考索、辨析史料的功力见长。王国维重视目录、校勘等文献基础工作,每治一门学问,都要先对相关书籍进行校勘、释读。每遇善本佳槧,必会与自藏本比勘,将异文和研究心得著录书中,因此批校之书极多。赵万里将其中重要的校本进行过录,如王校《水经注笺》、《穆天子传》、《蒙古史料四种校注》等十几种都有赵万里临校本。通过抄校,他吸取了王国维的校书经验,提升了校勘、考释古籍的能力。其间,他还在《国学论丛》上发表了《唐写本〈文心雕龙〉残本校记》,以敦煌写本残卷校嘉靖本《文心雕龙》,考订细密、严谨,校正异文数百条,足见其考校古籍能力的提升。

1927年6月2日,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。当天赵万里曾四处寻找打听,遍寻不获之际得闻噩耗,他悲恸不已。王国维遗书将身后书籍之事托付吴宓与陈寅恪二人,他们考虑到赵万里与王国维师生关系密切,且随侍日久,遂将整理遗稿的工作交给了赵万里。随后一年,他在研究院的工作转为全力整理王国维遗作。先后编写了《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》,收录王国维著述六十二种,书名之下写有提要,说明写作、编定经过及修订、发表情况等。《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》,著录王国维批校本一百九十二种,亦有提要说明校勘采用的版本、参考材料,并略有论析和补正。《王静安先生年谱》,总结王国维生平和学术,所述生平事迹详实可靠,论其学术发展演变、著述本末完备清晰。此三者都载于1928年《国学论丛》所设“王国维纪念专号”。此外,他撰写了《王静安先生之考证学》一文,对王国维在考证学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特色皆作了深入

论述。又将王国维遗著《唐五代二十一家词》整理出版,还将遗作中有关词论的内容加以辑录,发表了《〈人间词话〉未刊稿及其他》一文。离开清华之后,他并未中止编纂,而是将整理恩师著述、传扬其学术,作为了毕生的一项重要工作。三十年代初,他参与编写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负责王国维著作提要的撰写,共计完成四十三篇。诸篇提要不仅对王著详加介绍,并叙其创作缘起、宗旨,论其研究方法、学术价值,内容丰赡。且毫不讳言王著之失,在《两浙古刊本》、《曲录》、《录曲丛谈》等书的提要中均根据新材料和新研究成果指出了书中的缺失与谬误。1934年,他将王国维《古史新证》手稿影印出版。该书原是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上课时的讲义,其中有论“二重证据法”等代表其学术观念的重要内容,手稿一直为赵万里珍藏,尚未完整刊行过。之后,他又与王国华合作全面编辑王国维著述,于1940年出版了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》。此前罗振玉所编《海宁王忠愍公遗书》,带有一些主观之见,摒弃了王国维早年的著述,而赵万里所收范围要广泛得多,力求完备,故出版之后一直是王国维全集最通行的本子,影响很大,一再被重印<sup>①</sup>。50年代,王仲闻将其父藏书捐赠给北平图书馆,也是由赵万里经手操办,并编写目录。他所编撰的这些书籍、文章至今仍是研究王国维生平和学术的重要参考资料,对于“王学”之贡献,可谓厥功甚伟。在这一系列编撰过程中,赵万里全面研读了王国维著述,对其治学之精要有了更加深入的体会和掌握,潜移默化,将之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。赵万里的学术研究,很大部分是承“王学”之绪余而进一步发展。如他承袭“二重证据法”,重视纸上史料与考古文献相印证,整理出土墓志,编撰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》;借鉴王国维所编《密韵楼藏书志》,编成《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;补充、修正王国维《两宋监本考》,写成《南宋诸史监本存佚考》。在治学路径与方法上,他主要继承了王国维注重文献基础、史料支撑的一面,将研究重心置于

<sup>①</sup> 参考彭玉平:《王国维全集的编纂:历史回顾、当下需求与后续寻访》,《学术研究》2012年第10期,第107—108页。

古籍编目、校辑与考订，在目录版本学上成就斐然。同时，他更是继承了王国维一心向学的执着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，终生致力于学术事业，从无荒疏、懈怠。

赵万里感念师恩，在王国维去世之后给予其家人生活上的照顾。受王夫人潘氏之请，他教幼女王东明学习古文，为她准备了《古文观止》，悉心讲授一年时间。潘夫人举家南迁时，将无法携带的家具包括王先生的书桌留给了赵万里。赵家一直妥善保管，直至八十年代将书桌捐赠北大考古博物馆。“文革”时期，赵万里的藏书被悉数抄没，平反后归还之时，北京图书馆希望他将藏书中的十余部古籍捐献出来。时已病重的赵万里看过清单后，同意捐书，但表示其中一件务必要归还，那便是他当年过录王国维所校《水经注笺》的临校本，上面有王国维的两方钤印和一篇题赠之跋。跋文曰：

门人赵斐云酷嗜校书，见余有此校，乃觅购朱王孙本，临校一过，并嘱余识其颠末。余近岁方治他业，未能用力此书，时距今才六载寒暑，而人事之盛衰，交游之存亡聚散，书籍之流转，已不胜今昔之感。然则斐云以数月之力，为余校本留此副墨，亦未始尘劫中一段因缘也。丁卯二月十八日雪霁后观堂书。

此部校本，他视之为恩师留下的最珍贵的纪念，永不能相舍。王国维曾言：“余毕生惟与书册相伴，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，亦惟此耳。”<sup>①</sup>赵万里之志向追求，与此最为契合。他一生事业学问，不负王国维之教。

1928年7月，经陈寅恪介绍，赵万里离开清华去北平北海图书馆工作，任中文采访组和善本考订组组长。次年北海图书馆并入北平图书馆（以下简称北图），他仍为善本部考订组组长。时任北图善本部主任的是著名文献学、文物学专家徐森玉。他在工作上受徐森玉的指导，在古籍采购、编目、鉴定等业务方面受教良多。三十年代的北图汇聚了一批优

<sup>①</sup> 赵万里：《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日》，《国学论丛》第一卷第三号，第197页。

秀青年学者，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的谢国桢、刘节、王庸先后在此供职，还有王重民、孙楷第、向达、贺昌群、谭其骧等人，后来皆成为了学有独造之名家，可谓俊彦荟集，极一时之选，共同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。北图善本资源极丰，赵万里长期浸淫于宋元旧槧、名钞精校之中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在这对做学问极为有利的条件和环境中，赵万里的学术造诣进一步提升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

从二十三岁进入北图，直至去世，五十余年的图书馆生涯中，赵万里一直将北图善本部的建设视作本职工作，将采购、整理和守护古籍作为毕生事业，即使是在战事频仍的纷乱岁月中，仍孜孜矻矻，从未中断。二三十年代，私家藏书业难以继守，大多流散变卖，古籍交易市场十分活跃，引发了购书的热潮。在图书馆经费的支持下，赵万里南北奔走，为北图购回许多珍稀善本，大大充实了库藏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自他人职到1933年编写《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时，采入的古籍善本至少有一千多部。对于他这一时期的采书之功，傅增湘曾在《书目》的序文中大加褒扬曰：

袁君守和以专门名家，久领馆政，任是伊始，即延赵君斐云专任征访纂校之职。赵君夙通流略，允擅鉴裁，陈农之使，斯为妙选。频年奔走，苦索冥搜，南泛茗船，北游厂肆，奋其勇锐，撷取精英。且能别启恒蹊，自抒独见，于方志、禁书、词曲三者，蒐采尤勤。<sup>①</sup>

除方志、禁书、词曲三种外，数十册《永乐大典》及三百余种明刊明人别集也是这一时期采入的大宗精品。抗战爆发后，馆长袁同礼率部分人员南迁昆明，赵万里留守北平主持工作。战时许多沦陷区的藏书家为逃避战祸、维持生计，将大量藏书纷纷散出，日寇趁机大肆劫掠搜刮，将大批善本运往日本。为保护古籍文物免遭掠夺损毁，郑振铎、张元济等在上海成立了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，秘密搜购、收藏古籍善本。赵万里在北平积

<sup>①</sup> 傅增湘：《〈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〉序》，引自《旧京书影·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781—782页。

极支持响应,为“同志会”抢购北方市场的善本,如1940年5月购得元刊《乐府诗集》等三种,7月又购得元刊《中庸集解》等六种善本,寄往上海。郑振铎书信中曾反复提及“赵万里先生昨来一函,可见其为我们得书之苦心”,“赵先生为我们尽力极多”<sup>①</sup>等语。同时,他每年皆赴上海,参与沪上的文献抢救,在此期间也为北图收购了不少善本。其中最值一提的是在郑振铎的帮助下,购得了赵琦美抄校的《古今杂剧》二百余种。1946年,经赵万里奔走商洽,为北图购得天津“存海学社”<sup>②</sup>收集的海源阁旧藏善本九十二种,内中包括著名的宋版前四史。对此朱自清曾致信表彰曰:“兄多年来搜访珍籍,全力以赴。保存文化,厥功至伟!海源阁宋元本一事,尤其著者。佩甚佩甚!”<sup>③</sup>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,南京国民政府派专员赴北平,策划将北平文物古籍南迁。馆长袁同礼决定将北图数百箱善本佳槧运送台湾。赵万里为保护北图善本不被流失,积极奔走呼吁,争取各界人士支持,并根据郑振铎先生的建议,采取拖延的办法,与当局周旋抵抗。同时知会上海办事处,让他们注意保存北图存于沪上的善本。由于多方面的协作支持,使得北图的古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。新中国成立后,在国家鼓励收购和捐献古籍文物的政策号召下,他受文化部派遣,先后购得瞿氏铁琴铜剑楼、陈清华郁斋之珍藏等,鼓励劝说海宁蒋氏向北图捐献了衍芬草堂、西涧草堂所藏宋元善本,又接手经办了周叔弢、傅增湘、翁之熹、潘世兹等人的捐赠,使得大量善本荟萃于一地。至六十年代,北图的善本藏量在全国独占鳌头,达到了现存善本总量的百分之八十,质量更是精选上乘、无与伦比,成为了首屈一指的书林与学海。对于赵万里多年的搜访之功,周叔弢曾有精当的总结:

① 刘哲民、陈政文编:《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——郑振铎先生书信集》,上海:学林出版社,1992年,第89、116页。

② 1927年,杨敬夫为筹措资金,将海源阁藏书九十二种善本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。1931年到期后无力赎回,藏书面临被拍卖的风险。天津文化界人士潘朗、张廷谔、王绍贤等为此成立了“存海学社”,筹集八万元,购入这批藏书并妥善保管。

③ 朱自清:《致赵万里》,《朱自清全集》第11卷,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0年,第169页。

斐云版本目录之学，既博且精，当代一人，当之无愧。吾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，厥功甚伟。库中之书，绝大部分是斐云亲自采访和采集，可以说无斐云即无北京（图书馆）善本书库，不为过誉。斐云在地下室中，一桌一椅未移寸步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忠于书库，真不可及。<sup>①</sup>

然而，赵万里费尽心力为北图采书，尤其是建国后的大力收购和规劝捐献之举，在当时乃至今天仍有所非议，主要是认为其行事过硬，对藏书家有所不公<sup>②</sup>。诚然，在建国初的捐献热潮中，藏书家的捐赠未必全是出于自愿，不乏有迫于形势、疏财避祸的心态，这是特殊环境下的无奈之举。若从文物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，当时有的收购价格确会令藏书家蒙受损失。但是，就古籍流传和保护来看，清末以来，私家藏书走向没落，藏书世家大多无力支撑规模巨大的藏书事业，再加上天灾兵祸，使得藏书纷纷流散，海源阁被盜匪所躪，而宋楼尽归日人之手，劫余之书，基本都辗转流入了公立图书馆，变私藏为公藏，这是历史大势所趋。即使有一二勉力守护者，在书籍管理、保护上也经营乏术。三十年代，赵万里登天一阁时就发现阁中书帙零乱、潮湿霉烂、鼠啮虫穿等现象非常严重。且书籍与其他文物古董不同，其价值重在所承载的内容，历史性、资料性远超艺术性，作为私藏品束之高阁，秘不示人，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，反而湮没其价值。傅增湘一生以藏书为业，晚年终悟“信知私家之守，不敌公库之藏”，为使“今日矜为帐秘者，他日不委之覆瓿”<sup>③</sup>，毅然决定将藏书和手校本皆捐献公家。因此，赵万里的搜书购书或有不近人情之处，但是一心为公，一心为书，唯愿古籍能够得到妥善的收藏和保护，无疑是更值得肯定的。他的见识已深谙私藏非古籍管理之道，他的襟抱也超越了学者个人对书籍的钟爱，而表现为一种守护传统文化事业的人文主义关

① 周叔弢：《弢翁遗札·致黄裳》，引自《中国历史文献研究（一）》，武汉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22页。

② 参见陈麦青：《赵万里：一生为书》，《东方早报》，2013年6月2日。

③ 傅增湘：《藏书群书题记·双鉴楼藏书续记序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1085页。

怀。此后不久“文革”爆发，古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和损毁，若非藏于大型公立图书馆，这些珍稀善本定是难逃灭顶之灾，那将造成书籍史上无法估量的厄难。念及于此，不能不感佩赵万里的良苦用心。

古籍编目是图书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，同时也极具专业性、学术性。北图历史上共有三次大型的古籍编目，前两次都主要是由赵万里完成的。自1909年学部图书馆（北平图书馆的前身）成立以来，最初二十年中虽然组织过几次善本编目，但所编书目大多非常粗略，只有张宗祥《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》稿本记载较详，但此本并未公开刊行，只有稿本供内部人员使用。直至三十年代，北平图书馆尚无一部较为完整、便于学者参考利用的书目。且1929年并入北海图书馆之后，新增许多善本，期间又陆续购入不少，馆藏善本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于是亟需重新编撰一部适用的善本书目。时任善本考订组长的赵万里独力承担了这一任务，他一面进行善本的清点、补配、甄别、归类等整理工作，一面着手将整理好的善本著录编目，历时半年完工，于1933年编成付梓。此本《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著录的是该馆善本甲库所藏的善本情况，共收宋元明刊本及精校、名钞、稿本三千七百九十六种<sup>①</sup>。该目收录完备，著录详明，是“首次给学部图书馆以来收藏的善本书作了精细准确的明细清单，在图书馆收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”<sup>②</sup>。建国初十年间，北图接收了大量私家藏书，善本存量激增，赵万里于1959年主持编写了新的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，著录建国后新增入的善本书一万一千多种。此书目亦对书名、作者、册数、书号、版本情况等信息著录具体详细，核实准确，便于查阅检索，清晰地反映了北图善本收藏的阶段性的发展情况。同时，为了提高馆内外古籍工作者的业务水平，赵万里自1955年起在馆内开展目录学系列讲座，持续了十余年，系统讲完了史部目录学和集部目

① 1931年北平图书馆北海新馆建成后，将善本分藏于甲乙两库，甲库藏宋元明刻本抄本及名贤手校手抄本，乙库收藏清人著述。

②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：《〈旧京书影·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〉出版说明》，《旧京书影·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，第10页。

录学,至“文革”起才被迫中止。

由于古籍的材质由有机物构成,容易腐坏,也常遭虫蚁噬蠹、水火侵蚀,不少传世的古籍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,需要专业的修复。赵万里十分重视对古籍的修复,对所领导的修复工作竭尽全力。1949年,在关于修复《赵城金藏》的座谈会上,他明确提出了古籍修复需“整旧如旧”,即修复过程中应尽量保持古籍原貌,使其资料价值与文物价值不受损失,同时尽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。“整旧如旧”后来成为了古籍修复中的一项基本原则。以此项原则为指导,不仅《赵城金藏》的修复获得了极大的成功,近年北图在大规模修复敦煌遗书、《永乐大典》上也取得了突出成绩,“整旧如旧”的技术理论探索也在不断进步。赵万里还经常亲理其事,每次去琉璃厂买书都留意购买适合补配的旧纸,去南方出差总是要带回适宜装书的粗细不一的上等丝线,正如他所说:“只要对书有好处,我什么都愿意做。”<sup>①</sup>他还曾说:“我一日不死,必使库中之书不受委屈,我死则不遑计及也。”<sup>②</sup>其爱书之笃,丝毫不亚于访书之勤。古籍修复是一项对专业、技术要求较高的复杂作业,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工作人员。建国后,由于古旧书业的衰落,传统装裱、修复技艺日益凋零,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。为培养修复人才,赵万里不仅从民间请来装裱高手为北图工作,还和徐森玉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举办“古籍装修培训班”的建议。这项提议后被落实,有关方面在北图举办了两届培训班,至“文革”停办。

赵万里为北图贡献一生,与书相伴,也以书为媒,与各界人士展开交流与合作。在与赵万里往来的书信中,绝大部分是关于借书、抄书、读书、购书、评书的内容,交往者有学者、文化名人、藏书家、书商等等。其中郑振铎是与他过从甚密、交情最深的朋友之一。二人皆年轻有为,二三十岁即在学界、书界崭露头角,甚得时人推许,有“郑龙赵虎”之并称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参考冀叔英:《忆念赵万里先生》,《文献》1982年第2期,第155页。

<sup>②</sup> 周叔弢:《弢翁遗札·致黄裳》。

交往三十年间，他们在购书、编书、印书、抢救国家文献上通力合作，在学术研究上互相琢磨砥砺，成为了学界的一段佳话。郑振铎去世后，藏书捐赠国家，由文化部转交北图收藏，北图成立了“西谛专藏”。《西谛书目》出版之际，赵万里被推举为撰写序言的不二人选。因图书馆工作之便，赵万里常应人之请，代为查阅、抄写文献资料，或为他人阅读古籍提供协助。如吴晗为研究建州史和中朝关系，曾在1932年和1959年两次通过赵万里向北图借抄珍稀善本《李朝实录》，不论其身份是一名普通学生还是北京市长，他都鼎力相助，给予方便。

赵万里在工作上勤勉奋进，精力过人，除任职于北图外，还在多所重要的学术机构兼职。自1928年起，他先后在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辅仁大学、中法大学、中国大学等校任教，历任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，开设了中国史料目录学、目录学、校勘学、版本学、金石学、宋史史料目录学、图书馆学、中国版本史、中国戏曲史、中国俗文学史、词史等课程。赵万里最初在北大史学系授课，年仅二十四岁，却是年轻教师中出类拔萃者。他开设的中国史料目录学课程，非常受学生欢迎。他学识丰富，博闻强记，讲课生动，富有感染力和启发性，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有学生多年后回想起来还有记忆如新的描述：

赵万里先生的“中国史料目录学”，虽然只是史学入门的课程，但他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史料的来源、内容、演变、分散情形、重现经过、可靠性等等……原原本本、一五一十地介绍给这班青年史学家。也不知道他怎么对于史料这样熟，真所谓“如数家珍”。就凭这一课，就使人不能不羡慕北大史学生的幸福。<sup>①</sup>

其读书之广、识断之精、记忆之强，令人惊叹。上课不带片纸，各种珍本、善本的特点，刊刻年代、内容均烂熟于胸。娓娓而谈，均有来历。课堂上有问必答，略无迟滞。据说他幼年时走过几遍街

<sup>①</sup> 朱海涛：《北大与北大人：课程与图书》，引自陈平原、夏晓虹编：《北大旧事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376页。

道,就能把两旁商店招牌暗记背诵出来。<sup>①</sup>

许多著名学者如柳存仁、吴相湘、吴晗、邓广铭、张守常等都曾在赵万里的课上深受启发,有的还得到了赵万里的直接指导。如邓广铭在1938年进行辛弃疾的课题研究时,赵万里就是他的指导老师<sup>②</sup>,对他在史料整理和研究上有许多指导和帮助。邓广铭在《辛稼轩诗文钞存》的“弁言”中写道:“凡此校辑工作,所得赵斐云万里先生之指教及协助极多。”<sup>③</sup>他在辅仁大学的学生冀叔英,后就职北图古籍部,在工作中又得到了赵万里的言传身教,成为了目录版本学专家。

自1929年起,赵万里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、编辑员,负责校释《广韵》,此项工作后来由周祖谟完成,赵万里改为通讯研究员、编辑员。他的两部金石学著作《汉魏六朝冢墓遗文图录》、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》皆是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。同年他又兼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文献馆专门委员,至1949年结束。1927年,赵万里应吴宓之邀,与浦江清、张荫麟、王庸一起担任天津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编辑,1933年又改任《大公报·图书副刊》编辑,至1949年结束。自1928年起,他还一直担任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主编。工作除负责组稿外,还承担撰稿任务,他经常在这两种刊物上发表文章,文章多为古书题识和书评。他任职的这些机构,都是富有盛名的学术文化重地,可见他一直活跃在学界的中心,研究和工作能力为学界所公认。

赵万里不仅是一位学者,也是一位传统的文人雅士。他风度翩翩、神采奕奕,且舌灿莲花、谈吐不凡。朱自清曾作诗赞曰:“听子一神王,滔滔舌有澜。访书夸秘帙,经眼数精刊。历落盘珠走,沉吟坐客看。盛年

① 戴逸:《初进北大》,引自北京大学校友会编:《北大岁月:1946—1949的回忆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,第35页。

② 该项课题“研究指导人”一栏原来填的是胡适和姚从吾,但“七七事变”后胡适赴美,姚从吾南迁昆明,故1938年邓广铭在申请延长一年研究期限之时,将“研究指导人”改成了赵万里。参考刘浦江:《邓广铭与二十世纪宋代史学》,《历史研究》1999年第5期,第118页。

③ 邓广铭:《辛稼轩诗文钞存》,上海:古典文学出版社,1957年,第2页。

飞动意，不觉夜将阑。”<sup>①</sup>他自幼勤练书法，字迹颇受称道。雅好观剧听戏，常与家人、朋友一起去剧场观看演出，到南方出差也常观赏、考察地方戏。他喜爱草木，中学时制作的植物标本曾在校中展览。在京所居四合院中的园艺经他打理，佳木繁荫，四时鲜花绽放。他在大学时随吴梅学习填词，在旧体词创作上也有所得，偶尔作词遣怀或与人唱和，留下了不少词作，自己誊抄、编定为《斐云词录》一卷。谢国桢曾称：“他不但长于考据之学，而填一两首小词，也洒洒有致，翩翩然有江左徐庾风流的才华，而谨严过之。”<sup>②</sup>今观其词作，讲究用词炼句，以求合音韵、中法度，词中多感伤抒怀之语，风格婉约，小令长调既有秦淮海之缠绵凄冷，又有周清真之清丽雅致，堪为词家当行。兹录《鹧鸪天·癸亥春感》二首如下：

暂藉花阴作翠屏，未须金弹打流莺。那知雪夜琼宫里，已有霜天晓角声。风悄悄，雨泠泠，洞箫零乱可曾听。绝怜衾冷阑干热，春佔纱窗第几棂。

未负灯华划地寒，梦回翠羽说春残。尊前还有飘裙路，袖底终无息影阑。明镜里，两眉弯，红桑不许度屏山。餐霞休问人间世，到处斜阳作意难。

然而，这样一位工作勤谨、在学术事业上颇具声望的学者，一位富有风雅气息的文人，遭遇“文革”，自是难逃厄运。1966年“文革”初起之时，赵万里就被冠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，遭到无情的迫害。残酷的批斗和人身攻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，使他一病不起，瘫痪在床，行动和语言能力丧失殆尽。此时，他才过六旬，正是事业走向高峰可期登顶，学术成熟可臻化境之时。他眼看古籍善本大多已收归公藏，认为编著全国性古籍总目的时机来临，正在酝酿这一宏大计划；他开始总结多年文献整理、研究心得，着手系统撰写《中国版本学》、《中国目录学》；他以为自己身体康

① 朱自清：《赠斐云》，《朱自清全集》第5卷，南京：江苏教育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183页。

② 谢国桢：《怀念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》，《文献》1982年第2期，第148页。

健,尚不急于搜集过去的文章,编写文集……而当这场空前的浩劫席卷而来,一切计划皆化作尘埃,灰飞烟灭,学术生涯戛然而止。困守病榻十年后,他等来了平反的日子,“文革”时强加的各项罪名全部撤销,恢复了他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名誉。他欲重拾书笔,却已力不从心,那已是近黄昏的生命,再无夕阳无限好的光景。

## 二、赵万里之学术研究

赵万里天资聪颖,博闻强记,得从名校名师,又就职于学术重镇,在学问研究上起点既高,成名亦早。二十多岁已声名在外,为学界所推重,“洵为后来之英秀”<sup>①</sup>。他一生勤于治学,笔耕不辍,学术成果十分丰硕。据笔者初步统计,他出版了《校辑宋金元人词》、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》、《汉魏六朝冢墓遗文图录》、《中国版刻图录》、《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、《元一统志》等古籍整理著作六部,发表论文(含书评)六十余篇,撰写序跋提要八百余篇,辑佚古籍两百余种,编写教学讲义十余种。青年时代是他的学术高产期,许多重要著述在三十年代就已完成。战争年月为图书事业奔波,学术研究上略有迟滞。建国后又继续投入研究,厚积薄发,再创佳绩。赵万里治学审慎严谨,一丝不苟,撰述文章往往经过再三修订方予以发表,如《校辑宋金元人词》前后易稿三四次而成,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》经过二十年不断补充修正才出版,故其著述的细致性与精确性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。他早年涉猎的学术范围十分广泛,后来逐渐集中于文献学,在版本、目录、辑佚、校勘、金石、词曲等方面皆有不凡的贡献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语出傅增湘致张元济之信函,引自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3年,第237页。